

WENYIXIANGJUNBAIJI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影视方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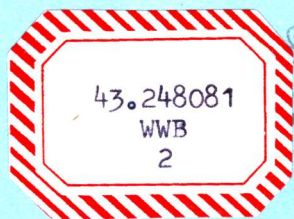
电影文论 卷

惟楚有材

於斯為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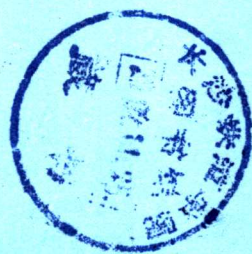


684216



影视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中南大学  图书馆



C0482981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影视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387-0/I·1787

本方阵定价:217.8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这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怎样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余开伟)/001

世纪之交的黄钟大吕(余开伟)/008

《故园秋色》的艺术风采(余开伟)/011

电影创新的精品(余开伟)/014

着意于领袖人物情感世界的开掘(李约拿)/017

吴子牛电影散论(李约拿)/023

刻意追求 质朴无华(李约拿)/032

漫谈周康渝和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李约拿)/037

湖湘文化与影视创作(李约拿)/045

市场·本土·制作(李约拿)/051

从《音乐之声》看国产音乐片(李约拿)/059

- 中国传奇片缺少些什么?(李约拿)/065
- 注意导演的心理定势(李约拿)/070
- 儿童片随想录(李约拿)/074
- 《国歌》的叙事方式简析(李约拿)/082
- 根植于生活的喜剧片(李约拿)/084
- 给历史题材作品注进当代意识(李湘树)/086
- 《泰坦尼克号》的两种读法(李湘树)/089
- 民族心灵的律动(李湘树)/092
- 《晚钟》二题(李湘树)/095
- 直面无奈人生(李湘树)/098
- 呼唤理解与沟通(李湘树)/102
- 《天网》断想(李湘树)/104
- 人的命题(李湘树)/106
- 千秋功罪细评说(李湘树)/108
- 战争诗意的抒情吟唱(李湘树)/111
- 轻重失衡(李湘树)/114
- 历史剧中的虚构(李湘树)/117
- 不敢抗日的抗日电影(李湘树)/120
- 情感世界新的开掘(林 澎)/122
- 男人艺术和艺术中的男人(林 澎)/124
- 也谈《牧马人》的艺术说服力(林 澎)/127
- 简洁、深邃、富于张力的艺术语言(林 澎)/133
- 正视人生这个美丽的陷阱(林 澎)/136
- 风格追求与对艺术的整体把握(钟友循)/139

- 创作思想与艺术表现(钟友循)/146
- “重塑金身”的尝试(钟友循)/161
- 《红高粱》的缺陷(钟友循)/171
- 太监、奴才及其他(钟友循)/179
- 也谈“淡化”(钟友循)/186
- 再谈“淡化”(钟友循)/194
- 赞《周恩来》中王铁成的表演(钟友循)/202
- 关于改革(35毫米)发行体制的构想(黄明辉)/215
- 苦难的历史 不屈的精神(龚政文)/223
- 文化人格与人生选择的错位(龚政文)/226
- 外柔内刚 独具风采(龚政文)/229
- 面向观众 走自己的路(舒其惠)/232
- 有感于我国当前的电影(舒其惠)/249
- 将与国歌一道载入艺术史册(舒其惠)/253
- 一部融浪漫于实史的爱情史诗(舒其惠)/255
- 弘扬精神与营造意境(曾耀农)/261
- 与狼共舞(潘一尘)/266

总跋(谭 谈)/279

怎样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从《文艺报》所载《鸦片战争》笔谈说起

余开伟

今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时刻,谢晋先生执导的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作为献礼巨片应运而生。对于谢晋这位老艺术家的强烈政治热情和孜孜不倦的艺术创造精神,我们十分敬佩。的确,《鸦片战争》以宏大的场面、广阔的背景、磅礴的气势和对历史人物的重新阐释取胜,其艺术性和观赏性都不同凡响。《文艺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罗艺军、余倩、邵牧君等六位影评家对这部影片的笔谈,给予高度评价和热烈赞扬,也属合乎情理(见1997年6月26日3版)。然而,认真拜读罗艺军等诸位先生的文章,却感到有些观点似是而非、扑朔迷离,使人不敢苟同。笔者斗胆提出质疑,但愿能得到编者、读者及上述诸位先生的宽容。

罗艺军先生说:“鸦片战争实质上是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两种文明的较量”,“《鸦片战争》表达的主题是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遭受屈辱。禁也罢,容也罢,战也罢,和也罢,中国的失败早已注定。因此在这部影片中,主和派的琦善没有被处理成一个卖国主义者,他与林则徐的矛盾是不同政见

之争,影片也没有结尾在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这种自发的群众性抗争扭转不了历史的进程。”余倩先生亦认为:琦善“并非一般奸佞之臣”,“他为了封建统治的利益妥协投降,扼杀了一个民族脊梁式的人物(林则徐),是出于‘全局观点’,为了‘江山社稷’,令人深思。”张卫先生则认为“琦善对战胜英舰信心不足是实,但未必是贪生怕死,卖国求荣。”“影片编导描写了琦善的对朝廷的忠诚,对同僚的诚恳,对战局分析的冷静。不是简单化地将他处理为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上述这些论点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需要我们进行冷静的、理性的衡量和审视。

鸦片战争的性质不能模糊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篇章,是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悲惨命运的开端。当时,中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落后农业国,英国是生产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双方力量对比是悬殊的。但是,这只是历史事物发展的自然层面,丝毫不能改变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华民族主权和领土野蛮侵略的反动实质。道光皇帝无论怎样昏庸腐朽,清王朝无论怎样软弱无能,封建中国无论怎样经济落后,这只能说明中国封建体制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并不能说明英国侵略者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凭着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军事实力对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进行野蛮侵略存在任何合理的因素;更不能把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疯狂掠夺和欺凌,一概视为传播现代文明。他们在中国贩卖毒品,他们掠走了中国的几亿两白银,

这难道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国力,使其走向现代文明么?西方一些殖民主义者正是高唱“文明战胜落后”的虚伪论调,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进行血腥征服,干着褻渎人类文明、践踏人类文明的种种暴行。如果我们一味宣扬强调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完全忽视鸦片战争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本质,这在理论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是有伤炎黄子孙正当的民族自尊心和正当的民族感情的。影片《鸦片战争》在揭露英军侵略暴行的同时,也刻意渲染了英国议会制度的民主气氛,画龙点睛地烘托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开拓东方贸易市场的雄才大略,浓墨重彩描绘英国进入蒸汽机时代的辉煌场面及英国舰队的威武雄壮,以此对比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愚昧和落后,以此揭示中国国势衰弱不堪,败局已定。连矢志抗英的林则徐,都对英国夷兵佩服不已,浩叹用铜制成的英吉利民族如何了得。影片的上述处理很难说是什“高屋建瓴”的深刻的历史观照,恰恰是它的败笔。因为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固然给英国殖民统治带来了一时的强盛,使它足以倚仗实力称霸全球,但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开疆拓土、对外侵略,对殖民地人民横征暴敛、血腥镇压,激起了强烈的反抗,也给自身添置了一条条锁链,导致了这个“日不落帝国”在二十世纪的逐渐衰落、一蹶不振。侵略和掠夺,曾经帮助资本主义国家获取资源和市场。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它却成了工业文明的毁灭剂。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把侵略和文明等同起来,很难令人信服。

影片突出了英国殖民者和清王朝的较量,却完全忽略甚至有意识回避了真正反映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坚不可摧民族意志和爱国反抗精神的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连一个虚写的场面或一句画外音的交代都没有,好像当时鸦片战争中根本不存在这场声势浩大、惊天动地的反帝

斗争。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的抗英斗争曾经重创入侵英军,使大量英军如惊弓之鸟,陷入重围,英国代表义律不得不请求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解围救出被困英军。林则徐曾极力支持平英团的斗争,认为“民心可用”。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鸦片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全回避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怎么称得上是“全景式反映鸦片战争”呢?我对此表示怀疑。而罗艺军先生却对此缺陷加以赞扬,认为“自发的群众性抗争扭转不了历史的进程”。按此逻辑推理,光炳史册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既然是不值一提的,那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公认的哲学论断是否也已经“过时”,应该完全推翻呢?对这种时髦论述我委实大惑不解。

落后不等于应该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今人的最新发现,早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许多有识之士即深刻体验和发现了这条真理。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国难、国耻的双重重压,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入侵,极大地激起了民族政治情感的高涨,而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更是忧国忧民,以至谭嗣同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望神州”的沉痛呼号。早在谭嗣同之前,林则徐就是一个力主放眼世界的思想先驱。他对洋务西学一直悉心研究。不但找人翻译书稿,更编辑《四洲志》专书。并且支持魏源把西方国家的富强之道作为客观参照物,探索立国之本,撰写《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他的后继者郭嵩焘、容闳、黄遵宪即是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盖出于落后

就要挨打的民族危机感。

国家落后就可能遭到强国侵略的危险,所以要发愤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落后就要挨打并不等于落后就是该打,并不等于弱肉强食就是天经地义。过分强调宣扬任何一方,都会走向极端,变成一种谬错。在思考历史的时候,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全部归咎于落后,这虽然抓住了重要的一笔,但未必很全面。战争的胜负和武器装备很有关系,和人心向背、指挥者的状况、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也有很大的关系。在世界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史中,不乏落后战胜先进的例子。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武器落后者战胜先进者。林则徐也曾痛击英军,使他们不得不北上定海、天津,寻找薄弱的突破点。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出于武器的落后,清政府昏庸腐朽的封建体制和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妥协投降路线,更是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影片设计了这样一个重要情节:林则徐怒斥献出广州官吏贪污受贿花名册的何善元,之后又当众烧毁这本花名册不予深究。这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表现了林则徐的高明权术和机谋,丰富了人物性格的复杂侧面,实际上是冲淡了掩盖了官吏贪污腐败对国家安危的严重破坏性和危险性。为了所谓“稳定大局”和“安定团结”,而宽宥大小官吏的贪污腐败作低调处理,实质上是一种养痍遗患的失策之举。这与历史上执法严明、雷厉风行的林则徐吏治风格大相径庭。影片设计上述情节是妙笔或是败笔,大可研究。至于把邓廷桢写成受贿者,于史无据,实属给民族脊梁抹黑。《清史稿》说他“无私”,和林则徐一起“名节播宇内”。丑化邓廷桢,给人造成错觉,仿佛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论反抗还是投降的,大家屁股上都有屎。这是混淆是非。

历史是非不能混淆

对林则徐和琦善之间尖锐矛盾的评价和褒贬,百余年来众说纷纭。但历史不可能是一笔糊涂帐,其中必有是非。把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和以琦善为代表的媚外派在鸦片战争这样一场关系着国家民族命运生死存亡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解释为清政府朝廷之间同是为着保护江山社稷的“不同政见”之争。这不仅有乖信史,也是极不公正的。而且这是有意无意对林则徐民族正义形象的贬抑,是对琦善卖国投降路线的开脱。

从影片中我们看到,入侵英军坚船利炮雷霆万钧,清军土枪土炮不堪一击,中方阵地血肉横飞、玉石俱焚。琦善谈虎色变,胆颤心惊,反复强调英国坚船利炮势不可挡,抵抗必败,只有妥协求和才是确保江山社稷的唯一出路,才是救国救民的万全之策。琦善甚至声色俱厉地振振有词质问力主抵抗的林则徐和关天培有什么取胜把握?林、关二人则理屈词穷、哑口无言。邵牧君先生对上述这些描写给予肯定,认为“林则徐似乎是第一次被颂扬的同时,受到了‘不览世事’、‘轻敌在先’、‘引敌入门’的批评。琦善则是把统治百姓放在首位的卖国奸臣奕山之流的替罪羊”。按照这种评价,仿佛琦善“求和有功”、“投降有理”,这个历史上公认的主张赔款割地、献出香港的卖国贼,不但不是民族的罪人,反倒是“顾全大局”、顺应历史潮流、忍辱负重的国家栋梁;林则徐、关天培这样历史上公认为民族英雄竟是“不识时务”、“逆流而行”的孤臣愚将。这种对历史的阐释很难说得上是什么“在国际上具有说服力的”、“客观公正的现代诠释”。翻一翻中国近代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则徐根本不是什么“不览世事”、“轻敌在先”、

“引敌入门”的冒险主义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对外国了解得很多，甚至也有某种主观臆测的成分。但和同时代的中国比较起来，他是站在历史的前列的。他是眼光远大、励精图治、魄力雄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事实上林则徐在抗英斗争中，厉兵秣马，严阵以待，使英军闻风丧胆，不敢轻狂，不得不掉头北上。关天培在穿鼻洋和尖沙咀海面，多次大败犯境英军。他坚守虎门，孤军奋战。琦善参倒林则徐走马上任后，“尽撤海防，遣散兵勇”，拒派援军，致使关天培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他却暗地派人到穿鼻洋与英国代表义律勾结，私自答应割让香港，订立了“穿鼻草约”，成了丧权辱国的卖国贼。把琦善这个贪生怕死出卖国家利益的民族败类涂抹成不得已为之的“替罪羊”式的悲剧人物，这对现在缺乏历史知识的青少年无疑是一种误导，不足为训。

诚然，文艺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它容许虚构和夸张，它容许艺术家对历史人物作新的阐释。但是，历史题材的创作必须尊重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不能违背历史的本质真实，改变历史人物的基本属性。我认为现在被某些舆论传媒宣传的林则徐形象和琦善形象，是被现实需要精心改装了的，并非历史上真实的林则徐和琦善。我们的观众是极为宽容的，对文艺作品常常满足于观赏性的愉悦，对其思想内容的缺憾往往忽略不计；我们的评论家又常常满足于乐善好施，广结人缘，廉价地奉送赞词和谀词似乎成了职业习惯。作为普通观众，从艺术探讨的角度出发，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这大概还是容许的。但愿听到对拙见的批评，使有所长进。

（载 1997 年 9 月 13 日《文艺报》）

世纪之交的黄钟大吕

余开伟

《国歌》以其气势磅礴、钢血交进的悲壮色彩,以其如火如荼、如山如海的民族精神,以其炽烈凝重,呼啸喷射的爱国主义激情,强烈震撼了观众,深深感染了观众,完全征服了观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歌》是世纪之交中国电影的黄钟大吕,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电影的精湛史诗,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电影艺术家吴子牛导演艺术的一个突破,是潇湘厂在电影事业上创建的一座高峰。毋庸讳言,《国歌》存在任何艺术精品都可能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辉煌的艺术光彩足以掩盖那些微不足道的瑕疵。

我认为,电影《国歌》展现的不仅仅是《国歌》的创作者——卓越的艺术家田汉和聂耳的不朽历史功勋;不仅仅是形象地阐释当时国歌产生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它以极其精炼、极其高超的电影艺术手法,为当代镌刻了一幅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肩负民族苦难惊天动地的永恒历史画卷;艺术地再现了一批民族精英挽救祖国危亡惨烈牺牲所表现出的大无畏

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无论是流亡大学生齐白山和林雪丽这对恋人参加的东北义勇军在白山黑水抗击日寇艰苦卓绝的战斗及其壮烈牺牲,抑或是十九路军将士在“一·二八”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与阵地共存亡的浴血苦战,无论是上海各界市民“宁为救国死,毋作亡国奴”的抗日大游行的悲壮声势,抑或是田汉、聂耳、吴印咸、梅香这些艺术家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拍摄十九路军将士与日寇殊死搏斗的历史场景,这都是真正的中华儿女钢铁浇铸的民族脊梁的神圣体现,是真正的中华儿女壮怀激烈的民族精神的艺术升华。正是亲身刻骨铭心地经历体验了这种中华民族的民族脊梁和民族精神的至圣至灵,田汉和聂耳才能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时代强音和历史绝响,它熔铸了民族的血肉,熔铸了民族的灵魂,熔铸了民族的苦难,熔铸了民族的抗争,它的每一个铿锵的节拍都是黄钟大吕的撞击,它的每一个豪壮的音符,都是金石交鸣的鼓点!它极大地鼓舞着全民族的意志和雄心,它将世世代代成为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在血火中巍然挺立的崇高丰碑。影片《国歌》让我们重温了新中国诞生曾经经历的民族危机和苦难历程,让我们重温了先烈们为创造新中国所付出的历史代价和惨烈牺牲,这在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今天,是有着特定的反思意义,它给予我们每个有良知、有血性的同胞的灵魂涤荡和心灵启示是不言而喻的。田汉的警世名言值得我们永远记取:“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无望和无救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借以自镜。

吴子牛先生说得好:“现在是该唱《国歌》的时候了。”壮哉斯言!电影《国歌》豪壮、沉雄的巨响,无异给当前影坛、艺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雄风,对绮靡世风无疑是一种正当的挑战和冲击,它所放射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光彩,是那些矫揉造作、